

中国文库

· 文学类 ·

鲁迅和中国文化

林 非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库
文学类

鲁迅和中国文化

林 非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和中国文化/林非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7. 9
(中国文库)
ISBN 978-7-310-02867-2

I. 鲁… II. 林… III. ①鲁迅(1881~1936)—思想评论②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I210.97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4856 号

特邀编辑: 李红强

责任编辑: 任增霞 刘 晓

整体设计: 翁 涌 李 梅

责任印制: 董文权

鲁迅和中国文化

Lu Xun He Zhongguo Wenhua

林 非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 300071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66 千字 印数: 1—500

ISBN 978-7-310-02867-2

定价: 38.00 元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 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友先 邬书林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从军 李东生
杨牧之 宋木文 张小影 柳斌杰 徐惟诚 龚心瀚

主 任：聂震宁

副主任：刘伯根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之江 王 琦 王瑞书 边彦军 吕建华 刘玉山 刘国辉
刘健屏 李 岩 李保平 李 峰 杨 才 杨 耕 杨德炎
吴江江 吴希曾 吴尚之 吴 斌 何林夏 汪继祥 宋一夫
宋焕起 张伟民 张 琦 陈 鹏 胡守文 俞晓群 祝君波
贺圣遂 贺耀敏 栾世禄 黄书元 曹 铁 龚 莉 惠西平
程大利 焦国瑛 解 伟 薛炎文

“中国文库”第三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刘伯根

副主任：刘国辉 宋焕起

成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殿利 刘晓东 李红强 汪家明 林 阳

徐 俊 潘凯雄

出版编务组：

李红强 仵永成 蔡增裕 谢仲礼 乔先彪

全冠军

目 录

第一章 鲁迅论中国传统文化	(1)
第一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评价	(1)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思想	(24)
第三节 对中国文化史上若干问题的见解	(44)
第二章 鲁迅论启蒙主义	(66)
第一节 近代以来的启蒙主义思潮与鲁迅	(66)
第二节 关于科学启蒙思想	(87)
第三节 关于文学启蒙思想	(106)
第三章 鲁迅论“人”的命题	(128)
第一节 “人”的命题的提出	(128)
第二节 “人”的命题的继续	(149)
第三节 “人性”与“阶级性”	(167)
第四章 鲁迅论国民性	(189)
第一节 国民性界说	(189)
第二节 “改革国民性”问题	(211)
第三节 “国民性”“弱点”剖析	(232)
第五章 鲁迅论中国新文化建设	(253)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比较	(253)

第二节 关于新文化建设·····	(275)
第三节 关于思想文化性格的建设·····	(297)
【附录】	
我和鲁迅研究·····	(317)
“五四”启蒙运动评价之正误·····	(336)
新版后记·····	(347)

第一章 鲁迅论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评价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相当丰富和复杂的概念，它最为确切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要对此点进行界说的话，也许就可以写出不少的论著来，然而鲁迅并不是一位系统探讨和专门研究某一种学科的学者，他几乎从未在概念的界说方面下过功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阐述和剖析也同样是如此，他并不是从概念的界说着手，列举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包括哪几个基本的方面，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或尖锐矛盾的种种关系，探索这种传统文化的起源、演变以及发展的轨迹，等等。鲁迅是一位异常犀利和深刻的思想家，像他这样对于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和深刻剖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对于表现在中国的许多书籍、绘画、建筑里面，以及渗透于社会生活每个角落中间的这种思想文化状态，通过自己异常独特的观察、感受和理解之后，竟至作出了如此振荡心弦和惊世骇俗的宏观性结论，认为“所谓

中国的文明^①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坟·灯下漫笔》），这就不能不提醒人们去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像他揭示的那样鲜血淋漓，那样极端的不合理和不健康？是不是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秩序的需要了？是不是应该十分急切地进行澄清和改造？是不是必须在中华民族已有的思想文化土壤上，迅速地去建设合理和健康的新文化？

从青年时期开始，鲁迅就以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主潮的深切感受，作出过下述的宏观性的判断，认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撓”^②（《坟·摩罗诗力说》）。应该说这种从他自己切身感受中间升华出来的哲理概括，是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特征的。“理想在不撓”，确实是在这几千年中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面貌，这种“不撓”的“理想”，规定着世代代的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精神现象，教诲着人们既不要去直面或改变严酷的现实，又不要去坦诚地披露或触动内心中真实的思想，而只需沿着一条既定的思想和精神轨迹，按照早已定型的道德伦理规范去思想与行动就成了。

① “文化”这个词汇最早见于《易·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所指当包括诗、书、礼、乐、风俗以及与之适应的社会制度。“文明”这个词汇最早见于《易·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据文化学家较为普遍的见解，两者可作同义词解，但后者外延大于前者，可以包括物质与精神的全部内容，而前者却主要限于意识形态的领域。

② 鲁迅所概括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不撓”的重要特征，是相当精确的认识。然而《摩罗诗力说》在当时和后来的“五四”启蒙主义运动中，都未曾引起过应有的重视，因此就无法在这已有的认识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这应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憾事。有趣的是“五四”启蒙主义运动中的不少先驱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与此相似的命题。如陈独秀认为“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李大钊认为“东洋文明主静”，“吾人之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惟以彻底之觉悟，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期与彼西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至于在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杜亚泉（佉父），也认为“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不同的是他主张“不可不以静为基础”（《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认为如果不保持这种“固有文明”，“假托于西洋思想以扰乱之”，“是犹望魔鬼之接引以入天堂也”（《迷乱之现代人心》）。

如果有人敢于违反这条“不撓”的原则,那么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鲁迅对此作出了相当深刻的回答,“有人撓人,或有人得撓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故性解之出,必竭尽全力死之;有人撓我,或有能撓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尽全力死之”(《坟·摩罗诗力说》),也就是说这些违反传统文化规范和理想的人们,只能获得灭亡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思考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不撓”的理想时,很明确地是从最高统治者(“帝”)和被统治者(“民”)这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的。“帝”所以要推崇“不撓”的传统文化理想,其目的是在于“保位”,并且使子孙万代永远为王,因此如果有主张“撓人”或“得撓”的天才产生出来,必定会狠命地加以扼杀;“民”所以也要推崇“不撓”的传统文化理想,其目的是在于“安生”,反对“进取”,苟且偷安地充当顺民,因此如果有主张“撓人”或“得撓”的天才产生出来,也必定会狠命地加以扼杀。正是由于“帝”和“民”都竭力在保持着这种停滞和封闭的传统文化理想,因此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迅速前进。鲁迅虽然暂时还没有明确回答“帝”与“民”这两种不同阶级之间的制约关系,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肃杀状态和氛围的感受与结论,无疑是异常准确和深刻的。他后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许多惊世骇俗的结论,应该说都是从这个起点出发而获得的。

鲁迅从自己进化论的理性主义科学观念出发,是坚决主张“撓人”或“得撓”的文化理想的,认为“杀机之昉,与有生偕”,“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坟·摩罗诗力说》)。在鲁迅看来,进化就是矛盾解决之后的飞跃,而在解决不断积累的矛盾过程中,从表面看来虽然是“平和”的,实际上却都在暗中变化着斗争的“杀机”,最后导致明显或剧烈的“动

作”，实现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前进。正是从理性主义的进化论科学观念出发，他明确地表示自己是“不撓”这种传统文化理想的反对者，并且强烈地指摘它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停滞和封闭。鲁迅这种渴望发展和变化的文化理想，不仅在20世纪初是一种异常杰出的主张，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珍贵的精神，因为“不撓”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遗留至今还在制约和影响中国社会中不少的人。

正是由于反对“不撓”的传统文化理想，形成了鲁迅对于诗歌这种文学样式较为激进的审美要求，认为“诗人者，撓人心者也”，“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彻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之”（《坟·摩罗诗力说》）。他要求诗歌创作能够触动人们的心灵，发扬“美伟强力高尚”的精神，冲破那种“蜷伏堕落”和“污浊之平和”的状态，认为只有置身于这样的文化背景面前，整个社会才有可能得到应有的进步。不过鲁迅所要求的这种诗的审美品格，又必然不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因为如果从鲁迅这样的审美品格出发，就必然会要求改变停滞与封闭的中国传统文化，促使它迅速地发展和前进，从而对有利于封建统治者的这种“不撓”的理想，将要造成极大的威胁，于是又必然会引起他们这些全盘拥护中国传统文化者的强烈反对，这样的因果关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了。

这就是鲁迅所指出的，“上极天帝，下至舆台，则不能不因此变其前时之生活，协力而夭阏之，思永保其故态，殆亦人情已。故态永存，是曰古国。惟诗究不可灭尽，则又设范以囚之。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竖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坟·摩罗诗力说》）。

“不撓”的传统文化理想,早已适应了历来的统治者(“帝”)和广大被统治者(“民”),使他们保持着“故态永存”的文明“古国”的生活秩序,于是在这种停滞和封闭的思想文化氛围中间,他们就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护着“不撓”的传统文化理想,反对诗歌创作“撓人”和“言志”的审美品性,力图约束和限制它自由地表达人们内心中的情感。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理想的“羁縻”之下,绝大地影响和削弱了其后的中国全部文学创作的宣泄感情和表达意志。

由于这种传统的文化理想,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学审美品格的缺乏真情实感,缺乏思想的震撼力量,从而变得平庸和荏弱,用鲁迅的话来说是“无有为沉痛著大之声,撓其后人,使之兴起;即间或有之,受者亦不为之动”(《坟·摩罗诗力说》)。从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情况来看,“伟美强力高尚”的审美品性确实是相当缺乏的,其间自然也偶或有咏叹“沉痛著大之声”的伟大诗人出现,然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理想已经渗透和笼罩在许多人的顶空,所以那些杰出的诗篇也就无法很好地打动他们。按照鲁迅的这种逻辑推理,即“不撓”的传统文化理想造就了“不争之民”(《坟·摩罗诗力说》),而“不争之民”又无法很好接受反对这种“不撓”传统的声音,鲁迅的感受和结论无疑是十分符合于整部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

由“不撓”的传统文化理想所塑造的“帝”或“不争之民”,始终在有意或无意地维持着这样的文明“古国”,阻碍着它的向前发展,于是这个停滞和封闭的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状态,就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译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一个在精神状态上渐趋衰老的国家是否会最终导致灭亡,这有着许多跟当时世界局势相关的客观条件,但是它的“固有而陈旧的文明”,促使整个民族变得“一切硬化”,很难随着周围世界的步伐向前迈进,无疑也是造

成它“走到灭亡的路”的强烈内因。鲁迅所谓的“一切硬化”，是指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始终沉溺在“固有而陈旧的文明”氛围中间，人们的一切感情、意志、精神和思想，都还散发着此种“固有而陈旧的文明”的味道，使它依旧在支配着 20 世纪人们的心理和灵魂，依旧成为广大民众推理和行为的规范与动力，古老的幽灵和陈腐的思想，还始终活在 20 世纪人们的心里。生活在 20 世纪里的人们，却还保留着几十个世纪之前的思想和精神面貌，这种“硬化”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是多么可怕和令人痛心啊！

这种思想和精神状态的“硬化”，永远会使得许多人从根本上无法适应于时代的发展，也无法使自己发生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而是在保持这种古老文化心态的同时，在表层上张贴一些新鲜的标记而已。鲁迅对这种社会文化心态知之甚详和甚深，一再指出它十分荒谬的矛盾状态，“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热风·四十八》），“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圣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挣钱；既说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热风·五十四》）。形成了这种停滞在古老精神世界里“硬化”状态之后，无论出现多少五花八门的新鲜标记和摩登玩意，都不太可能从这里产生旧精神的蜕变和新精神的萌生，而只是若干零零星星的新的文化现象，混杂在整体凝固的旧文化状态中间，由于它无法影响和改变人们“硬化”的精神世界，这些新东西往往成了时髦的形容词，其实质往往被极大地扭曲和融化了，而在这种“几十世纪缩在一时”的现实生活展览会中间，“硬化”的古老灵魂却依然故我地支配、控制和消融着许多新涌现出来的文化现象。

正是这种“硬化”的精神状态，在顽固地阻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与前进。鲁迅在探讨“中国进化的情形”时，认为“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

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臙杂”（《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一百多年以来，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这种人类最高思想成就在内的西方近代文化不断涌入中国，同时却又不断出现称颂儒学（以及各种新儒学）的思潮，这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学说（以及儒、道、释三家合流的思想），长期牢固地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中间，起着支配和控制的作用而“并不废去”的缘故。这种“反复”和“臙杂”的文化现象能够得以产生，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在于那种“不撓”传统文化理想，早已使人们的精神状态变得“硬化”了。只要存在着这种“硬化”的精神状态，就会永远使传统文化保护自己古老和陈旧的原状，延宕、排斥和阻挡作为整体的新文化在民族的土壤中产生。鲁迅经常思考“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说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华盖集·这个与那个》）。如果要寻求其答案的话，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是由“硬化”的精神状态所造成的。

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之后，整个世界都在迅猛地前进，中国却还始终停留在落后和古老的思想文化状态中间，因此鲁迅才会这样深深地感叹，“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东西去，都变成漆黑”（《两地书·四》），“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花边文学·偶感》）。只要在整个民族中这种“硬化”的精神状态，还没有开始得到很好改变的话，任何外来的“新制度”、“新学术”和“新名词”，进入了中国社会这“黑色染缸”之后，就会被改变得面目全非，“固有而陈旧的文明”的主导精神线索，却依旧坚固地矗立着，这种陈旧的精神与古老的思想成为影响新时代的灵魂。最为惊人的例证是西方民主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学说系统地传播到中国，也已

有好几十年的历史,然而这两者都受到传统思想文化的不断抵制,更为可怕的是传统思想文化竟侵入到二者中间,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歪曲和腐蚀着它们的精神实质,这样就不可能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水准,更不可能很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有什么文化现象会比这更可怕和值得警惕的吗?

鲁迅抓住这种“不撓”的传统文化思想,进一步从文化学的角度,思考“不争之民”的悲惨命运,得出了广大人民在旧传统箝制底下,精神状态已经趋于“硬化”的见解,从而充分认识到不管有多少外来的新文化现象风起云涌而至,却都像是掉在“黑色染缸”中,无法动摇和改变这种“硬化”的精神状态,尽管也可以涂上一层时髦而又漂亮的饰金,这确实是切中古老传统文化为何长期得不到改变的根本关键。那么如何才有可能去改变“不撓”的传统文化理想和“硬化”的精神状态呢?这不能不引起关心整个民族命运的鲁迅去认真地思考。

二

“五四”启蒙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它那种全面地冲击旧文化的痼弊,破除几千年来对于传统文化迷信的勇猛气势,强烈地激励了鲁迅的战斗精神^①,使他发出了对于旧文化的英勇无畏的控诉,开始指摘“四千年”来的“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然而“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呐喊·狂人日记》),这可以说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惊心动魄的揭露。吴虞认为《狂人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吃人与礼教》)。在当时揭露传统文化痼弊的启蒙主义者中间,鲁

^① 据《呐喊·自序》,钱玄同曾抱着“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动员他参加当时启蒙主义的工作,这是他开始于《新青年》撰文的缘由。